文明：文以化人 日新其德

蒲宏凌

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，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把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之一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趋势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。

中华文明经历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，延续着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。其中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、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和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，共同形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面貌，对于建设文明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价值。

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

文明的进步不仅需要薪火相传，代代守护，更需要与时俱进，不断创新。敢于革新，勇于创新，一直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强大生命力。早在商汤时代，其浴盘上就镌刻有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的铭词，旨在激励自己澡身而浴德，澡雪而精神，既要盥洗身体，更要涤荡心灵，保持向新求新的精神，产生日新月异的进步。修身养性如此，治国理政更需如此。《诗经》有云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意思是说，周朝虽是古老的邦国，但其使命却在于革新。同样的道理，中国虽是文明古国，但想保持长盛不衰，就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。
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引用这些典故，以此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，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，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。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，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出“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”的理念和方法，要求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、民主政治、先进文化、社会治理等的发展需要，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之相协调相适应，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，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，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。这些观点，契合时代需求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。

开放包容，交流互鉴

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，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。历史上，自汉代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，引进了葡萄、苜蓿、石榴、胡麻、芝麻等西域特产，传入了琵琶、箜篌、筚篥、横笛、羯鼓等外来乐器，丰富了国人的文化生活。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，同中国的儒家文化、道家文化相互碰撞交流，彼此融合发展，不仅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，而且最终形成了儒、佛、道三教鼎立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，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。近代以来，无数仁人志士努力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文化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，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中国人民取得国家独立，实现民族富强，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。

民族多元一体，文化多样共存，中华文明之所以形成如此独特的文化景观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“和而不同”的哲学观念，这造就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、兼收并蓄的胸怀和气度，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，能够积极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生机和活力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，各国相互联系、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，越来越成为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命运共同体，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已经成为时代潮流，中华文明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，天下大同”的理念将越来越显示出重要力量。

坚守善道，天下大同

在传统典籍中，文明一词被赋予了更为深远的意义。《尚书》说：“帝舜曰重华，协于帝。浚哲文明，温恭允塞，玄德升闻，乃命以位。慎徽五典，五典克从；纳于百揆，百揆时叙；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；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弗迷。”舜担任领导职务后，推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的道德教育，百姓顺从，百官称职，四方和睦，风调雨顺。朱熹解释说：“《中庸》所谓‘择善固执’，择善，便是理会知之事；固执，便是理会守之事。……‘浚哲文明’，便有知底道理；‘温恭允塞’，便有守底道理。”这种善的力量，正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地方。所谓文明，就是坚守善道。

《易林》有“文明之世，销锋铸镝”之言，就是说，文明之世即是和平之世，没有战争，没有暴力。梁启超《变法通议》说：“文明之世，以道理为势力；野蛮之世，以势力为道理。”这里便是将“文明”与“野蛮”对举。文明之世，政治昌明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人人各得其所，能够坚守善道，力行善道，因而古人常以有道指代文明，而“大同”正是有道的象征。《礼记》载孔子之言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是谓大同。”这段对于大同社会的经典描述，正是中华文明对于理想社会的梦想与期盼。

文明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，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文明建设走上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正确道路。进入新世纪以来，又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“五位一体”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目标。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把“文明”确定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，这是对以往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，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、塑造国家形象的指针。建设文明中国，需要我们每个人从自身做起，坚持中国道路，弘扬中国精神，凝聚中国力量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

（作者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室）

（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）

□ 中国民间工艺

华县皮影：光影间跳动的精灵

王锦强 覃 奕

在电影还未出现之时，皮影艺人们就是夜幕降临后最引人注目的“魔术师”和“畅想家”。循着琴声鼓乐和婉转优美的唱腔，人们纷纷聚集到亮子前，看才子佳人的缱绻情愫、名臣良将的忠心义胆、神灵仙道的超凡法力，如何通过皮影艺人的巧手演绎，幻化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的一幕幕如泣如诉、如真似梦的奇妙享受。

皮影作为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表演艺术和手工艺术品，在城乡街区、村寨广为流传，并独具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。中国皮影戏艺术作为完整的戏剧，比莎士比亚早了1800多年；使用影像艺术，比卢米埃尔发明的电影早了2100多年；作为纯粹民间具有“摇滚”感染精神的音乐，比猫王早了2160年！

陕西省华县皮影被称为“中华戏曲之父”和“世界皮影之祖”。按照华县当地传统，人们的婚丧嫁娶、逢年过节大多会请皮影戏班子连唱几个晚上。“一口诉说千古事，双手对舞百万兵”是华县皮影戏的舞台形象写照。

华县皮影班社一般由5人组成，演出时各司其职。班社演唱的碗碗腔源于宫廷音乐，委婉动听，百听不厌。“前声”负责剧中各角色的唱腔、道白，并司月琴、堂鼓、手锣、云锣、干鼓，同时还兼有口技和帮签之责。“签手”负责操作全部影人的表演动作及相应道具的摆放，兼执夹白、帮唱，以及舞台音响及灯光特技。“下档”司板胡，负责影人的安装拆配，兼司马号、唢呐、音响，帮签及对白插话。“上档”司二弦、唢呐、大钗子、长号，兼帮签及对白帮腔。“后槽”司大锣、小钗子、战锣、梆子、铜碗，大钗子及帮腔。五人配合默契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平时演出，每人一辆自行车就可携带全部道具，在巷道庭院，室内室外都可演出，搭台用料简单，有顺口溜云：“两块方桌，九块楼板，用椽七长八短，五叶芦席一卷，四条大绳一捆，十二根线串（细麻绳），放一撅头，你就甭管。”

而这舞台幕后的主角，除了“一双巧手调动千军万马”的皮影艺人，还有“一把刻刀塑尽喜怒哀乐”的皮影雕刻师。汪海燕就是其中一员出色的女将。她继承了父辈传下的华县影刻绝技——“推皮走刀”技法及24道主要工序。

在20余年的皮影创作实践中，汪海燕逐渐形成了自己刀法洗练、雕镂缜密、造型流畅、敷色明快的创作特点。王海燕创作的皮影雕刻作品《唐明皇击鞠图》在雕刻轮廓内部时以镂空为主，又适当留实，做到繁简得宜、虚实相生。整幅作品气势开阔、纹样丰富；既有动态的势，又含静态的韵。《张生戏莺莺》则选用雪花、拉丝等传统皮影雕刻技法，辅以清淡素雅的染色工艺，用皮影的空灵精巧再现剧中“系春心情短柳丝长，隔花阴人远天涯近”情景交融的古典画卷。

华县皮影起源于秦汉，形成于隋唐，成熟于宋元，鼎盛于明清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目前，华县皮影戏及皮影雕刻工艺传人规模渐大，还有八家班社四出演唱传统剧目，并已发展成为华县一大特色文化产业。

汪海燕皮影作品《白蛇传》

□ 汉字故事

乱解“苏堤”令人喷饭

杨立新

苏堤春晓为杭州西湖十景之首。北宋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，曾疏浚西湖，取湖泥葑草堆筑成堤，故称苏堤。在苏堤压堤桥南端，立有一通康熙皇帝御书的“苏堤春晓”石碑，为西湖十景碑中唯一的原始石碑，故历史文物价值极高。然而，由于看不懂其中的繁体字，一些人竟作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解释。

杭州西湖“苏隄春晓”碑

由左下图可以看出，“苏堤春晓”碑上有两个繁体字。一为“蘓”字，与常见的繁体字“蘇”写法不同，康熙将草头下面的“鱼”“禾”位置对调；再就是“隄”字，没有用“土”旁的“堤”而写成了“阝”旁。

对此，2014年10月27日《XX晚报》发文称：“‘苏’字玩颠倒纪念苏东坡”，认为“苏堤春晓”碑上的“蘓”字和“隄”字都是错字——

“苏”字的繁体本是“蘇”，草字头之下，左“魚”右“禾”，而碑上的“苏”字却是右“魚”左“禾”。传说苏东坡特别爱吃鱼，每次吃鱼的时候，如果侍者把鱼放在左边，他可以把整盘鱼都吃完，如果放到右边就要生气，因为苏东坡是“左撇子”，所以康熙帝故意把“魚”写在右边，以此纪念苏东坡。

而“堤”字则把“土”旁写成“耳”旁，这个原因就有两个了，一是因为“耳”的字形与苏堤的地形相似，另一个则是取之意境，在苏堤上可以听到六种声音。后来碑上这两个字被编入了《康熙字典》，有了正式的身份，不再是别字了。

上文关于“苏堤春晓”碑的说法纯属胡编乱造，荒谬绝伦。事实上，“蘓”“隄”二字压根儿就不是什么错字。

“蘓”字早在唐代《干禄字书》中即已收录，注明为“蘇”的俗字。在过去，一些汉字的左右部件位置可以互换调用，如够—夠、秋—烁、和—咊、獨—𤞶等。其实，“蘓”字这种“鱼”“禾”对调的写法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陶盖文“蘓（苏）解为”中即已出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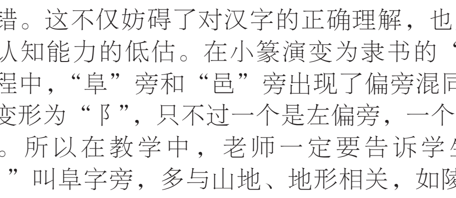
秦代“苏解为”陶盖文拓片

尤为可气的是，编造者为了自圆其说，竟胡诌苏东坡是“左撇子”。苏东坡的书法“左秀而右枯”，缘于其写字时“腕著而笔卧”，史书上并无苏东坡是“左撇子”的记载。如今坊间流传着苏东坡是“左撇子”的说法，盖由此出。

“隄”和“堤”均见于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。《干禄字书》注明“隄”为正字，而现在的通用汉字“堤”为俗字。1955年发布的《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》，将“隄”作为“堤”的异体字予以淘汰。

关于“隄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：“隄，唐也。从𨸏（阜），是声。”“唐”即塘，为“塘”的古字。所以，“隄”字不是“耳”旁而是“阜”旁，与耳朵没有任何关系。因此，所谓“苏堤上可以听到六种声音”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。

关于“阜”，《说文解字》解释为：“阜，大陆也。山无石者，象形。”可知，“阜”的本义为土山。其实，只要将“阜”字的甲骨文向右旋转90度，也就成了甲骨文“山”字。故元人称其为“侧山旁”。



甲骨文“阜” 甲骨文“山”

中小学语文教学中，“阜”旁常被形象化为“左耳旁”，“邑”旁被形象化为“右耳旁”，实则大错而特错。这不仅妨碍了对汉字的正确理解，也是对学生认知能力的低估。在小篆演变为隶书的“隶变”过程中，“阜”旁和“邑”旁出现了偏旁混同现象，都变形为“阝”，只不过一个是左偏旁，一个是右偏旁。所以在教学中，老师一定要告诉学生，左“阝”叫阜字旁，多与山地、地形相关，如陵、陡、阿、阳、险、降、队、陷等；右“阝”叫邑字旁，多与城邑、地理有关，如邦、都、郡、郊、邓、邢、郑、郭等。

由此可以论定，“蘓”“隄”两字早已有之，并非因康熙书碑才编入《康熙字典》的。康熙是再正常不过的书写，绝无任何寓意可言。如此乱解可发一噱，实在是唐突东坡先生了！